

中印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印度对中国在西藏主权实际而不是形式认可的问题。

是一个不能轻易排除的事实。”

印度、西方反华势力及达赖集团三股力量相互呼应,并向中国在西藏地区的主权进一步逼近,是1998年南亚问题的重要走势。中印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印度对中国在西藏主权实际而不是形式认可的问题。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立即得到一向以非暴力主义自居的达赖的呼应。5月13日,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访问的达赖为印度辩护,达赖集团藏青会也对印度核试验成功表示祝贺,称赞印度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表示支持印度拥有和保持强大的核力量。同时,达赖加大鼓吹“与北京对话”的力度。6月17日,达赖在欧洲表示,希望克林顿访华时与中国政府谈“西藏问题”。克林顿访华结束后,达赖进一步鼓吹要求在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10

月底,达赖着手准备所谓西藏“政治地位”的声明。为此,达赖在10月底和11月5日分别会见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美表示支持西藏“保持独立传统”。12月8日,达赖在法国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希拉克共进午餐后对记者表示,他将寻求“通过对话”,使西藏实现“真正自治”。1999年1月20日,美国政府任命朱莉娅·塔夫脱为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总之,1998年,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进程急剧向政治冲突转变,南亚政治力量组合出现新的变化,印度人民党政府强硬外交政策牵动了南亚地区安全的多米诺骨牌,大国全球战略部署迅速向南亚集结。上述诸多变化尚在继续演进中,它将规定1999年南亚形势发展的基本走向。

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

(中东形势报告节选)

—— 吴 强 钱雪梅

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人均占有石油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产量与消费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1%~22%。在中国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以后,石油消费量迅速增加。1986~1996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从9730万吨增至1.719亿吨,年均增加746万吨,年均增长5.86%,而石油产量仅从1.307亿吨增至1.573亿吨,年均增加仅266万吨,增长1.87%,中国石油消费缺口在1996年突破了2000万吨,对外石油需求量及能源供应依赖程度明显加大。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制定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战略,建立石油供应安全保障体系,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开拓国际市场,寻求建立长期稳定的国外石油供应渠道,补充国内资源不足,已十分迫切。

从全球范围看,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的地

区首选中东。截止1998年1月1日,世界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390.92亿吨,其中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以356.75亿吨居首,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伊朗分居其后2~5位。仅这五国储量就占全球总量的约65%。在产量方面,全世界1997年石油产量为32.47亿吨,沙特阿拉伯以4.0825亿吨排在首位,中东主要产油国的总产量为10.64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近33%,其储采比在90年以上,而全球储采比不到43年。此外,由于不断扩大投资,中东产油国产量在2000年可望达到2110~2440万桶/日,2010年可达2820~3350万桶/日,2020年则接近3850万桶/日,可以保证具有充分的供应能力。中东的石油出口量目前占全球石油输出量的一半以上,在今后15年内将上升到67%以上,且中东石油开采成本为世界最低。所有这些在世界上都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在下个世纪初至下世纪中期,能够维持大规模石油生产及输出的主要是中东,能够大规模长期稳定向中国提供石油出口

中国在制定下个世纪石油进口战略中,应该以中东为主,以中亚、俄罗斯辅之,其他地区作为战略性多元化补充。

的地区也主要是中东。中国在制定下个世纪石油进口战略中,应该以中东为主,以中亚、俄罗斯辅之,其他地区作为战略性多元化补充。

自 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中国从中东的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1997 年已达到 1678 万吨,而且这一数字在今后数年内仍将继续上升,对中国经济安全本身构成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已经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它要求中国在对中东政治、外交、经贸等政策方面都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保障中东石油这一战略性资源能够长期稳定地对中国供应。

能源合作的可行性

90 年代之前,由于涉及的切身利益不多,中国与中东地区在外交和经济上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在海湾战争后,中国与中东地区迅速接近,而且这种接近是以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为基础的。对中东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正崛起的大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东问题上,中国一直坚持符合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利益的原则立场,长期以来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使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警戒减少,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减缓各国国内对政府向美一边倒的指责,增加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实现安全保障的多元化。中东产油国十分清楚,结成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建立利益相关的经济关系,是促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积极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保障产油国安全及利益的最重要的基础。在中国方面,为未雨绸缪、保障日益迫切的石油供应需求,同样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加强了对中东事务的关注,高层出访增多,而且出访中都明确表明中国希望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愿望。有了这个政治基础,双方的能源合作就有了政治上的保证。

在经济方面,石油是中东石油输出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 1981 年以来,国际石油市场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油价屡屡暴跌,目前已跌至近 25 年以来的最

低点。低油价不仅减少了这些国家的收入,也减少了他们的市场份额,而这两者对于它们的经济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1998 年以来的低油价和两次减产,使其市场份额更加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迅速、能源需求强劲且进口量不断增加的具有巨大消费及投资潜力的大市场,自然会成为中东石油输出国追求合作的重要目标。从中国方面考虑,一方面中国确实存在大量进口中东石油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使中国对亚洲出口减少,中国对中东市场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而这一市场在过去一直是非常有限的。双方政治经济上的共同需要,奠定了双方的能源合作的可靠基础。

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即大量进口中东石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承受力及国际石油市场的反应。从中国的承受力方面来讲,综合各种国际机构的估计,一般认为 2000 年油价大约在 18~20 美元/桶之间波动,2005 年平均为 25 美元/桶,2020 年前几乎不可能超过 30 美元/桶。假定中国 2000 年的石油进口为 3500 万吨,届时的石油价格为 20 美元/桶,则需外汇约 52 亿美元;2010 年进口 8000 万吨,届时油价为 25 美元/桶,则需用汇 150 亿美元左右;2020 年进口一亿吨,届时价格为 30 美元/桶,则需用汇 220 亿美元左右。而按中国的九五规划,2000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4000 亿美元(1997 年为 3251 亿美元),其中进出口各为 2000 亿美元,则届时购油用汇占进口总额约 2.6%,2010 年用汇也不会超过进口总额的 6%,而且中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 1450 亿美元。因此,在经济上中国是有能力承受进口石油费用的。何况,石油贸易并不是一种单方面行为,它同时也将推动中国与中东的相互贸易,在相当程度上抵消购油用汇。如果在进口结构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原油进口为主,加强在国内的加工炼制,并有适量出口,则不仅会提高石油贸易和石油企业整体效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用汇压力。

对国际石油市场而言,中国石油进口在一亿吨/年以内时,会对油价上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会构成大的冲击。仅伊拉克一国在解除制裁后即可向国际油市投放一亿吨/年的石油。因此,国际市场不会因中国进口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中国的进口促使油价温和上升更会受到中东的欢迎。

中国在中东并没有全球战略上的图谋,而只有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在中东将是一个稳定性力量而不是一个竞争性力量。

能源合作方式的选择

尽管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可以承受大量进口石油的财政压力,但如果全部从市场上直接购买,既无必要,也会增加成本,增大风险。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中东石油市场上,除直接购买一部分石油以解决最紧迫的需求缺口外,按国际通行惯例,加强了对中东石油资源市场的勘探开发活动。这样做,不仅可以逐步建立起一些海外石油供应基地,以股份油的方式运回国内,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直接外汇支出,还可以增强对国内资源的储备和保护。

从1996年起,受油价低迷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的影响,中东各国纷纷修改投资法,允许外国公司在石油勘探、开采、加工、运输、炼制等上下游领域进行投资参股,就连一向对外紧闭大门的沙特1998年也被迫将部分石油领域对外开放。这无疑是中国进入中东石油勘探开发市场的一个难得机遇。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石油企业在勘探开采技术上已具有了相当的实力。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更在全球最大50家石油公司排名第15位。近年来,中国在参与中东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7年6月该公司获得一项价值12.6亿美元的共同开发伊拉克阿达卜油田(估计储量10亿桶)的为期22年的合同,一旦联合国解除对伊制裁,该油田在二三年内就可形成50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中国可获得200万吨/年的股份油。另外,中国在伊朗也获得了一些开发合同。1998年6月,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联合国批准的伊拉克“石油换食品”第四轮协议中,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1800万桶巨额石油合同。不过,由于进入时间较短,资金、技术力量有限,在沙特、科威特等国的开发尚未取得大的进展,但应该还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参与中东的油田勘探开发,应当获得国家的特殊政策支持,从战略角度看,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超出常规商业考虑的。如果经过努力,在15~20年内,在中东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供应基地,争取使股份油占进口油的1/5到1/4,不仅会大大减少风险,而且还可以减少一般进口量,在能源安全上会有利得多。

在参与海外勘探开发的同时,中国也应加强与中东的投资合作,以合资方式在中国国内建立起若干炼油厂。80年代以来,中东产油国采取多种方式相继进入原油消费国下游领域,参与石油精加工项目,并对中国表示过兴趣,只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市场限制等原因而未达成大的合作。实际上,合作建立炼油厂,不仅可以按合同供油的产油国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连,共担风险,促进石油的稳定供应,而且可以吸引巨额资金和先进技术,提高中国的加工水平。从保障供应及提升中国原油加工炼制能力考虑,中国仍需在开放国内石油市场、推动石油加工领域的资金技术合作方面进一步放宽政策。

当然,目前进入中东勘探开发市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油价过低,商业上不值得;勘探开发的条件大多已相对较差,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等。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政策、资金、审批等方面予以特殊扶持,从战略上而不仅仅从商业上对这种行为给予支持。

中东石油国际竞争与中国

中东石油占美国进口石油的17.1%,占欧洲进口石油的44%,占日本进口石油的70%,美国将中东视为其切身利益之所在,西方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欲望在下一个世纪仍将是极为旺盛的。

中国作为最近才突然加入中东石油进口大军中的新成员,自然会引起不少国家的担心与恐惧。为保证中国的石油供应和在中东的投资利益,中国必须在战略上作出相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安排与准备,才能使这种供应有可靠、安全的基础。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因石油问题介入中东,并不构成对美国在海湾战争后实际取得的中东主导地位的挑战。中国在中东并没有全球战略上的图谋,而只有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在中东将是一个稳定性力量而不是一个竞争性力量。中国为保障石油的安全供应,将力求促进中东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保证国际油路的畅通,维护中东石油稳定持续的国际供应。而这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西方切身的经济安全利益是不相冲突的,同时也是符合中东国家利益的。

其次,作为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应当为亚洲

中国应当联合亚洲、特别是对中东石油供应严重依赖的日韩等东亚国家，组成亚洲（东亚）能源安全供应保障共同体。

下个世纪的经济安全及石油供应安全作出自己相应的贡献，就像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一样。中国应当联合亚洲、特别是对中东石油供应严重依赖的日韩等东亚国家共同担负起一定的促进中东政治与经济安全稳定方面的责任，组成亚洲（东亚）能源安全供应保障共同体，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并共同加强对中东的投资，提高对中东决策的影响力，促进中东石油供应的安全程度，减少相互间的资源争夺，使中东的能源供应成为东亚合作的桥梁，而不是冲突的根源。

第三，中国应当与亚洲（东亚）国家一起利用各自的

资源、技术和资金优势，建立东亚石油安全供应及储备体系，利用中国相邻的俄罗斯及中亚巨大的油气资源进行调控，减轻中东石油市场可能出现剧烈波动时的冲击。

第四，在军事上，中国必须为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作出必要的安排，并力争建立某种地区性的安全体系，在保障亚洲共同安全的基础上获得邻国的理解，减轻邻国的疑虑。增强必要的军事力量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和能源供应安全的必要保障。否则，中国的经济安全就是脆弱的、易受威胁和打击的。

拉丁美洲在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拉美形势报告节选）

江时学

实现对外经济关系多元化应该是中国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外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格局中，拉美地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一、中国与拉美具有进一步扩大双边经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与拉美的关系由来已久。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迄今为止，中国已与 19 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中国同拉美、加勒比地区的未建交国的关系也在改善。例如，1993 年，多米尼加同中国达成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1996 年 3 月，中国在巴拿马城建立了“中国巴拿马贸易发展办事处”；同年 9 月，中国同海地在纽约签署了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拉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看法越来越相同或相似，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许多拉美国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理解和支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例如，在 1997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上，拉美 11 个成员国中

有 8 个国家对中国提出的对西方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投了弃权票或支持票。1997 年 9 月，中国同巴西就加强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表了“联合声明”。此外，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大多数拉美国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反对台湾“重返联合国”。虽然一些国家已连续多年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提案，但支持台湾策划“重返”提案的中美洲、加勒比国家在数量上正在减少。

随着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与拉美之间的高层往来日益频繁。1990 年 5~6 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拉美。杨尚昆主席在访问墨西哥期间，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拓展经贸合作、加强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拉关系“四条原则”；在访问乌拉圭时又提出了促进中国同拉美友好合作关系的“五点建议”。1997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江泽民主席在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题为“增进友好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他指出：“中国一贯重视加强同包括墨西哥在内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CONTENTS

Study o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Wang Sirui

Special Contribution

Dialogue on the Socialist Restructuring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Reform in the Rural China

—Du Runsheng

To see the Future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hip

—On Jiang Zemin's Visit to Japan

—Tanino Sakutaro

Feature Article: The Analysis Repor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1998 – 1999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Globalization (Chen Jinsheng Liu Jinghua) The Turbulence of World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Yu Yong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the Growth Prospect of China (Wang Jian) The U. S. Econom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He Liping) Japan in Restructuring (Yang Xuejun) The Russian Strategy for Economic Security (Zheng Yu)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E. U. (Liu Jinghua) The New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ASEAN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 (Ma Zhigang) The Situation of South Asia after the Nuclear Test and Its Possible Development (Zhang Wenmu)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id – East on the Energy Affairs (Wu Qiang Qian Xuemei) The Role of Latin America in China's Economic Security (Jiang Shixue)

Investigation Report

The Urban Agriculture of East Asia in the Modernization

—Dong Zhenghua Yuan Weidong

The International Potential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Our Policy

—Centre for "One State, Two Systems" (H. K.)